

书香政协

渝·悦读

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中国解法

——读《认识中国：乡村的前途与中国现代化》有感

□ 刘小兵

油墨香里浸润着泥土芬芳的《认识中国：乡村的前途与中国现代化》(入选2025年7月“中国好书”推荐书目),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、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的最新力作。这部由社会学者以质朴笔触写就的著作,用田野调查的扎实数据与贴近生活的生动观察,系统阐释了中国乡村的现代转型逻辑,为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视角。

全书围绕农民与现代化的关系、乡村社会变迁、治理逻辑、生计模式、城市化路径及中国认知六大维度展开,既剖析乡村现状,又探讨建设方向。作者提出,中国现代化是“三轮驱动”的有机进程,而乡村作为现代化的“稳定器”与“蓄水池”,其战略价值远未被充分认知。作者将目光投向田间地头:留守老人打理的菜园、农民工行李箱里的腊肉、春节返程车后备箱塞满的腌菜……这些被GDP增速遮蔽的生活细节,在他笔下成为解读中国模式的关键密码。他特别指出,“半工半耕”的家庭分工模式,既支撑了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,又避免了拉美式贫民窟的滋生,这种观察既延续了费孝通“乡土中国”的学术脉络,又注入了数字经济时代的现实观照。

书中关于“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”的论述尤为深刻。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,部分农民返乡仍是

“多双筷子的事”,这种朴素的生存弹性背后,是土地承包制构筑的安全底线。尽管作者对“小农立场”的坚守常被讨论,但其背后的深层逻辑,是对复杂国情的深切敬畏。当他在书中追问“谁是农民”时,并非简单质疑统计口径,而是揭示被归为“农业转移人口”的群体真实生存状态:他们白天操作数控机床,夜晚视频指导父母耕作;春节带回智能家居,也捎回改良稻种。这种“两栖生存”的实践,恰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微观注脚。作者以“接力式城市化”概念精准概括这种代际累积的进城策略,相较“激进城镇化”的主张,更贴合农民的实际需求。

第六篇“如何认识中国”堪称全书方法论精髓。作者倡导“从土地中长出现论”的研究路径,反对用西方理论框架裁剪中国经验。这种学术自觉贯穿于每个案例分析,如对村庄中农(即“中坚农民”的简称)的解读,便突破了传统阶层分析的局限。当他描述豫东村庄里承包50亩地的“新中农”如何成为乡村秩序核心时,读者能清晰触摸到,这不是书斋里的理论推演,而是沾着泥土的鲜活认知。这种“饱和经验法”培育的洞见,往往比量化研究更能触及中国社会的复杂肌理。

以乡村振兴为切入点,作者客观审视“三农”问题与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关联。在他笔下,乡村绝非浪漫

主义的田园牧歌,也非等待拯救的落后符号,而是现代化进程中的“减震器”。这种理性认知,对避免政策制定中可能出现的急躁冒进具有重要警示意义。书中反复强调的“兜底式建设”理念,实质是提醒我们:与其打造华而不实的示范村,不如先为每个农民筑牢生存底线。

字里行间,能深切感受到作者厚重的时代忧思。这种扎根现实又心怀温情的学术品格,使本书超越了一般乡村研究,成为理解中国道路的重要注脚。

站在时代发展的坐标回望,书中预言的诸多趋势已渐次显现:县域经济的蓬勃兴起,印证了“接力式城市化”的前瞻性;持续涌动的返乡创业潮,生动诠释着农村“蓄水池”的功能。当某些国家因产业转移陷入社会撕裂时,中国乡村展现的韧性恰如作者描绘的那般——它或许不够光鲜,却总能在风浪中提供最基础的支撑力。这种支撑力,或许正是中国现代化航船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。

《认识中国：乡村的前途与中国现代化》不仅是一部乡村研究的学术精品,更是一把解码中国现代化的钥匙。在城市化加速推进的今天,书中那些饱蘸泥土的思考极具启示:乡村振兴不是简单的推倒重建,而是在传统与现代间寻找新的平衡。

访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

□ 李光辉

就在这个地方
发生过一桩惨案
很多呼吸被窒息了
很多肉体被蹂躏了

来到展馆里
看着一张张照片
读着一个个文字
我也有一种窒息感
那空袭的飞机
那投掷的炸弹
那燃烧的火焰
让我喘不过气来

走在隧道中
借着一点点光亮
踏着一粒粒尘土
我也有一种躁踏感
那拥挤的人群
那汹涌的呼喊
那痛苦的呻吟
让我如同背负了万钧

但我还不能离开
我要在这里
用窒息和躁踏的想象
感受生命的极限
用坚韧和顽强的毅力
站成不倒的城墙

双城记

双城生活

□ 杨力

今年夏天回到重庆北碚老家,站在老屋的窗前,望着鳞次栉比的高楼,崭新的北碚城让我心头泛起阵阵感慨。

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夏天,我国工厂改制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岗位。独自蹲在嘉陵江边的我,望着打旋东去的江水,心里和这江水一样迷茫——妻子在纺织厂做活,工资微薄;女儿刚上初中,学费、生活费像座小山,压得人喘不过气。那时的成都,于我不过地图上一个遥远的地名,与我的生活毫无交集。

转机出现在2003年。老同事捎来消息:成都新建的开发区招工。我咬咬牙,踏上了西行的绿皮火车。这是我第一次到成都——宽阔的街道、整齐的绿化带、拔地而起的厂房,让我看花了眼。很快,我在一家电子厂找到了工作,月薪八百块,周末加班还能多赚些。从此,我开始了“双城记”:周一到周五在成都做工,周末坐长途汽车回重庆看家人。

这样的日子一晃就是5年。生活渐渐有了起色:家里换上了彩电,装上了固定电话;女儿考上了重点高中,妻子的眉头也舒展开了。可我总是觉得自己像片浮萍,飘在两座城市之间,找不到根。

变化是从成渝动车开通开始的。曾经4小时的漫漫长路,缩短到了两小时。车厢里不再只有扛着蛇皮袋的务工者,多了穿西装的商务人士、背相机的游客、带着孩子出游的家庭。我也跳槽去了物流公司,负责成渝线上的货物调度。老板拍着我肩膀笑说:“现在你可成了双城经济的纽带!”那一刻我才惊觉,自己早已不是单纯为生计奔波,竟在不经意间融入了时代的浪潮。

2015年,女儿考上了成都的大学。她用兼职赚的钱给我新买了手机,手把手教我视频通话。第一次通过那块小屏幕,我同时看见了重庆的妻子和成都的女儿——两座城市的距离,在科技的温度里忽然近了许多。后来,妻子不再留守重庆,我们在成都租了房子,她找了份超市的工作。周末女儿回来,一家人就逛宽窄巷子、吃串串香。

去年,我带妻子回北碚老家。社区主任上门征求意见:老城区要改造了。邻居们围坐在院坝里,凑着看规划图,争着提建议——老王头说要建个小花园,李大妈提议加健身器材,连平时少言的张叔都翻出老照片,说“这儿该留棵老黄葛树”。我忽然明白,我们不仅在讨论老房改造,更是在亲手规划自己的生活,对未来有了话语权,也有了期待。

最触动我的是今年春节。女儿留在成都高新区工作,除夕不能回北碚老家。我和妻子决定去成都过年。高铁上,满是往返两城的人,脸上没有我当年的迷茫疲惫,只有轻松与从容。到了预定的餐厅,饭桌上,女儿给我们看她参与开发的项目——一款连接成渝商贸的软件。“爸,你当年在两城间奔波,我们现在用数字技术把两座城市‘连’起来了。”那一刻,我百感交集。从被迫为生计奔波,到主动选择双城生活;从物质匮乏的焦虑,到精神充实的从容;从被时代浪潮推着走,到成为参与者、塑造者。如今的成渝双城,早已不是地理概念上的“两城”,而是血脉相连的“共同体”——互补共生,彼此成就。

双城之间,写满的是普通人的生活轨迹,更是这个时代最温暖的注脚。



雄险奇幽的丰都夹壁山

熊波 摄

抗战中的重庆文艺名人

徐悲鸿:

笔底家国 艺魂永铸



徐悲鸿(1895—1953),原名徐寿康,江苏宜兴人,中国现代美术事业奠基者、杰出画家与美术教育家。

留学法国研习西画,归国后深耕美术教育,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,以笔墨丹青书写家国情怀,以艺术革新推动中国美术现代化进程。

全民族抗战爆发后,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,寓居江北盘溪。面对国难当头、民不聊生的现实,徐悲鸿以笔为戈,淋漓尽致地发挥“笔杆抗战先锋”“反侵略尖兵”的作用。他曾说:“战士为国不怕牺牲,我徐悲鸿只能用自己的画笔去战斗了。”

面对日寇的侵略,徐悲鸿拿起画笔,创作了大量宣传和讴歌抗战军民的美术作品。1938年创作的《巴人汲水图》,是他思想境界、艺术主张集大成之作。作品塑造了“舀水”“让路”“登高”三组人物,反映外敌入侵、国运危殆之时,百姓虽生存艰难,但坚韧不屈、抗争到底、终迎胜利的决心和信心。1940年的《愚公移山》,歌颂中国人民勤劳勇敢、百折不挠的精神,鼓舞抗战最艰苦阶段的中国人民。1942年的《哀鸣思战斗》,通过马的昂扬不屈,激励国民不畏失败,继续战斗;同年创作的《六骏图》中的马,气势威猛、体魄健硕,象征中国的抗战精神。1943年创作的《会师东京》,题款“略抒积愤,虽未免言之过早,且喜其终须实现也”,表达抗争必胜、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的信心……这些作品,从不同角度表现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坚贞不屈,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时代特征给人以震撼。

除以作品鼓舞人民外,徐悲鸿还辗转海内外举办义卖募捐画展,多次将售画所得悉数捐给祖国,支援抗战。1938年至1942年,他携作品赴中国香港和新加坡、印度、马来西亚等地,向海外侨胞宣传抗日,并将卖画所得的近10万美元全部捐献给祖国;1939年他在新加坡举行筹赈画展,郁达夫曾著文报道:徐悲鸿“举办赈灾救亡义卖画展共得港币一万五千三百九十八元九角五分,由星华筹赈会汇交广西,作为第五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遗孤抚养之用……”;1942年回国后,他又在昆明举办劳军画展,将收入全部用于慰问前线将士。徐悲鸿把大笔钱财捐赠给祖国,自己却过得十分俭朴,“尽其所能,贡献国家,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”的赤子之心,令人动容。

面对中国画界守旧僵化的局面,1920年6月,徐悲鸿发表了《中国画改良论》一文,主张“古法之佳者守之,垂绝者继之,不佳者改之,未足者增之,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”。1948年4月,他在《益世报》发表《复兴中国艺术运动》,进一步表达自己变革中国美术、复兴民族艺术的意愿。在这期间,他还发表了《对中国近代艺术的意见》《中国新艺术之展望》《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》等文章,详细阐述自己对当时中国艺术的看法。

徐悲鸿不仅发表文章呼吁艺术革新,还在教学实践中推行他的革新主张。1946年,徐悲鸿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,随即推行教学改革,要求学习“国画、西画、雕塑、图案(的学生)在第一二年共同修习素描”,就是要将西方精湛的写实技巧融入中国美术。次年10月,徐悲鸿发表《新国画建立之步骤》,指出“新中国画至少人物必具神情,山水须辨地域,而宗派门户,则在其次也。所谓物有本末,事有始终,知所先后者,理宜如是也”,“故建立新中国画,既非改良,亦非中西合璧,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”。徐悲鸿毕生主张现实主义,建立了一套完整的、以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基础的“写实主义绘画教学体系”,被誉为“中国画的革新者”“现实主义美术的倡导者”。

徐悲鸿始终以“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画出来留给后人”为信念。20世纪30年代初,他以《田横五百士》《九方皋》等巨作借古喻今,传递爱国情怀;1937年除夕,遇嘉陵江畔拾荒老妇,连夜绘就《巴之贫妇》,记录底层苦难;新中国成立后,他把创作的目光投向了各行各业的劳动者:为劳模模范画像、赴水利工程施工地速写,用画笔聚焦建设者,让艺术扎根人民。他笔下的马“不戴缰轡、奔放不羁”,更成为近现代中国画的精神象征。

徐悲鸿一生留下进步的艺术思想、完整的教育体系与无数经典之作,为中国美术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。

(重庆历史名人馆 文/图)



徐悲鸿画室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石家花园。